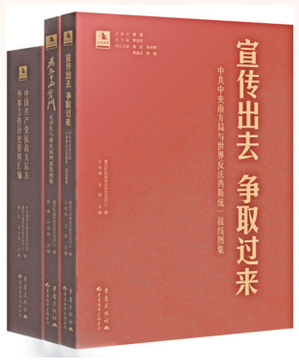
翻开本期读书版，三本佳作带我们回溯峥嵘岁月，触摸精神根脉。它们分别从文献汇编、群体研究和口述叙事等不同维度，引领我们重返历史现场，思考民族命运与个人选择。这些著作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让红色基因与家国情怀跨越时空，为当下注入前行力量。 ——编者

传承红色基因 铸就时代丰碑

——《红岩文库》的编纂背景和价值内涵



■李忠杰

百年变局激荡寰宇，红色血脉奔涌新章。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提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战略部署，强调“必须增强文化自信，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文明赓续的战略高度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为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按照重庆市委指示精神，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联合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新华出版集团等，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责任感，组织编纂了《红岩文库》。这既是一项以学术匠心守护精神根脉的文化工程，也是以历史主动回应时代之问的具体实践，更是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文明底色的创新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为主要内容的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保护与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影响全国的重大研究成果。20世纪80年代，中共重庆市委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共同开展南方局历史资料征编和研究，编写出版了《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六卷本），为开展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奠定了基础。1989年，《红岩春秋》杂志在重庆创刊，邓颖超同志亲笔题写刊名，《红岩春秋》成为学习、宣传和弘扬红岩精神的重要阵地。

2004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中共重庆市委在重庆举办了纪念南方局成立65周年座谈会暨红岩精神研讨会。会议期间，推出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修订本）、《千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图集》《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等成果。同时，正式宣告“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的成立，并确立了工作的基本任务和目标，使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的研究、宣传工作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的领导下，在重庆市和其他南方各省党史部门的共同努力下，2008年推出电视剧《周恩来在重庆》（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2011年播出电视文献片《千秋红岩》。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李忠杰总主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在2008年至2017年之间相继出版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红岩精神研究》《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四军》《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华日报》《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等卷。这些重要图书的陆续完成，共同构成了南方局历史和红岩精神研究、宣传的基本成果，高质量完成了中央交办的光荣任务。

长期以来，中共重庆市委高度重视南方局历史遗存的保护工作，围绕建设全国一流革命传统教育基地的目标，先后整治了曾家岩50号周公馆周边环境，修复建成曾家岩广场；新建红岩革命纪念馆新陈列馆，完成红岩革命纪念馆改造工程，建成红岩广场；维护和开发利用了中山三路中共代表团旧址和化龙桥《新华日报》总馆旧址，从总体上形成了一个以红岩革命纪念馆为主体，以宣传南方局革命斗争历史和红岩精神为主要内容的革命传统教育基地。2007年，为进一步保护和利用好红岩革命历史资源，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整合为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负责保护红岩革命文物、传播红岩精神和管理红岩景区、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和所属革命遗址群。其中红岩村、周公馆、《新华日报》营业部、中共代表团驻地、“中美合作所”集中营旧址、桂园旧址先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红岩革命纪念馆和歌乐山革命纪念馆被评为国家AAAA级景区。

红岩革命历史文化有着十分丰富的内容，在全国有着重大的影响力。

《红岩文库》聚焦红岩革命历史文化研究，系统整合红岩革命历史遗址文物及考释、档案文献整理与解密、书信诗文辑录、口述史料汇编、影音资料修复、历史研究深化、理论阐释创新、文物保护活化利用、党员干部和青少年读物等多元载体形态，构建多维立体的标志性成果体系。它不仅是史料整理、学术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也是构建“大思政课”体系的生动教材，更是贯通活化历史资源、弘扬传承精神、赋能时代新人的红岩文化育人链条的重要支撑。《红岩文库》既为党员干部淬炼党性提供鲜活教材，也为青少年培根铸魂打造红色课堂；既为文旅融合注入文化灵魂，也为城市发展厚植精神底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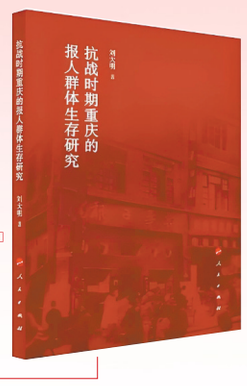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红岩文库》的编纂出版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理论学术价值在于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框架下，系统构建红岩革命历史文化体系，进一步丰富中共党史、抗战史、统战史等研究内容，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提供经典范式；其历史研究价值在于以权威的史料、丰富的文献和大量革命遗址全面呈现革命实践场景，用学术话语阐释精神密码，为百年大党永葆初心提供历史注脚；其现实借鉴价值在于立足新时代文化强国战略布局，紧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通过解码红岩精神历史逻辑与时代价值的有机统一、守正固本与转化创新的辩证互动，为破解新时代信仰培育难题提供智慧启迪，为应对全球价值观交融碰撞贡献中国方案。这既是对革命先辈的深情致敬，更是对历史与未来的使命担当。

当历史的烽烟凝为书页中的思想结晶，当先辈足迹镌刻成精神图谱的永恒坐标，《红岩文库》必将以学术的深度、思想的温度、传播的广度，铸就赓续红色血脉的时代丰碑。

（作者系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本文为《红岩文库》总序节选，有删改。）

抗战报人如何“以笔为枪”

——《抗战时期重庆的报人群体生存研究》读后



■陈俪文

近读刘大明副教授撰写的《抗战时期重庆的报人群体生存研究》一书，作者引领读者回到硝烟弥漫的抗战年代，聚焦重庆报人群体以笔为枪，以纸为阵，传递战况，守护真相的崇高使命。值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循着本书的脉络回望这段历史，不仅是对媒体先辈专业精神与爱国情怀的致敬，亦可引发当代思考：在和平年代，媒体人应如何继承抗战报人坚守真相、服务人民的传统。

借助大量的报刊史料、口述历史和档案文献，本书生动再现了报人在防空洞中写稿、在断纸缺墨下印报、在政治夹缝中争取言论空间的艰难历程，绘就了一部血肉丰满的报人生存史与抗争史。该书从“以人观群”的独特视角，将抗战时期重庆报人的个体生存经验与群体历史命运紧密结合，突破了传统新闻史研究中“群体抽象化”或“人物碎片化”的局限。从个体叙事的微观切口揭示民族危亡中的群体镜像，还原了重庆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职业困境与精神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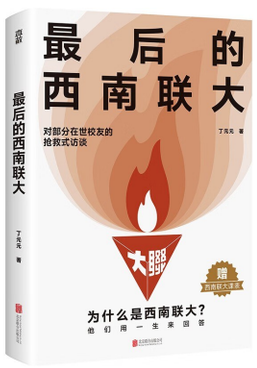
为塑造更为立体饱满的报人形象，作者进一步构建了“生存”与“抗争”的双重叙事维度，使历史叙事兼具社会史的思想深度与人物史的情感温度。一方面，通过对报人经济状况与社会关系的剖析，揭示其在物质层面的生存逻辑；另一方面，通过对国民党严苛的新闻审查与《新华日报》舆论对抗的还原，构筑了报人群体的精神困境。

透过这些生存细节与精神抉择探其深层价值，便能发现本书最具理论深度的贡献，在于重构了战时中国媒介与权力的互动关系，揭示了媒介在民族危亡中所承担的身份认同功能。书中尤以国民党当局唆使特务焚毁《新蜀报》编辑部及印刷厂一事为例，记载周钦悦求助潘梓年、获周恩来迅速资助而解除急困的经过，真切展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下，不同力量间既冲突又协作的复杂生态，也见证了进步报人团结互助、共度危局的历史一幕。同时，进步报刊不仅是权力博弈的战场，更是塑造民族认同的有力工具。报人借对国际反法西斯新闻的报道，既凝聚全民抗战意识，也向世界传递了中国抗战的正义性，将报人的个体职业行为升华为民族精神的集体动员。这些微观实践不仅拓展了我们对抗战时期舆论生态复杂性的理解，也凸显出媒介在历史转型中超越信息传递的深层社会与文化价值。

由此可见，《抗战时期重庆的报人群体生存研究》一书，以“人”为镜，照见了抗战新闻史的宏大图景。本书不仅是一部行业生存史，更是一部抗争史；不仅是对历史的忠实记录，也是对学术研究的勇敢突破。书中对个体叙事与群体镜像的平衡处理，为新闻史研究提供了方法论启示。唯有将人物的血肉之躯置于时代的熔炉中，方能还原真实的历史。

以史观今，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今天，本书具有特殊的纪念与启示意义。这段历史不仅让我们回顾过去，更为理解新时代媒体责任提供了历史参照。书中报人“以笔为枪”的实践，不仅书写了一段不屈的历史，更将伟大抗战精神延伸至当下社会——那种在危难中恪守真相、在压迫中捍卫正义的精神，依然激励着新时代媒体人在复杂语境中保持专业定力与道德勇气。在技术重构媒介生态的背景下，媒体不能止步于信息中介，更应成为人民利益的守护者与社会信任的建构者。

《最后的西南联大》：温情叙事与精神传承的珍贵记录



■刘异秀

早在多年以前，我便对西南联大及其精神内涵有所耳闻，却始终未能系统了解这所特殊高校的历史全貌。直到某次在线课程中，老师提及西南联大及其校长梅贻琦，并称西南联大在短短八年零十一个月的时间里所培养的人才规模与质量，至今无高校能及。这番话引发了我的强烈好奇：究竟是怎样的学校，能在那样艰苦卓绝的岁月中培育出如此众多的卓越人物？

西南联大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及南开大学三所各具传统的高校合并而成。在梅贻琦校长的卓越领导下，三校师生跨越背景差异，融洽共处，共同缔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段非凡的历史激起了我浓厚的兴趣，促使我通过阅读进一步探寻其精神脉络。

在众多相关作品中，我选择了丁元元所著的《最后的西南联大》。在我看来，这是一部兼具思想高度、历史深度与人文温度的力作。作为一名非历史科班出身的“联大迷”，作者自2014年起投身于对西南联大历史的挖掘工作中。他借助新闻报道、历史档案及校友名录等渠道，寻访到20位健在的联大校友，并展开了抢救式采访。书稿于2015年底完成，2022年正式出版。彼时受访者大多已届耄耋之年，更有数位于成书前离世，使得这部作品更具史料稀缺性与历史珍贵性。尽管采访过程遭遇诸多困难与误解，作者仍坚持以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感完成这一工程。其工作不仅是对史料的搜集，更是对历史记忆的抢救与致敬。凭借深沉的热爱，作者不仅留存了校友的珍贵回忆，更细腻刻画了那个年代他们的生活细节与情感世界，为后人理解联大精神提供了丰富的一手材料。此外，非学术化的叙述方式也增强了该书的可读性。

本书另一突出特点在于其独特的叙事视角。作者并未聚焦于杨振宁、李政道、汪曾祺等知名人物，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以往被历史叙述忽略的普通学子，通过他们的亲身经历，再现联大的精神传统，并对现有文献形成重要补充。

例如，在采访吴德鋐先生时，作者了解到其恩师、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常对学生说：“想要当官的不要来，我这里是‘政治学系’。攻读政治学绝不要为了做官，要立志当一个社会改革家为上策，立志当一个正派的政治学者为中策，如果这二者都当不成，就当一个普通人，趋炎附势钻营求官为下策。”张奚若本人以身作则，曾在抗战期间多次公开批评时政，甚至在国民参政会上直斥国民党的腐败，以“布衣教授”的风骨诠释“言行合一”。受其影响，吴德鋐因拒绝加入国民党而辞去职务，终身保持无党派身份。这样的精神通过教师的言传身教，深深植根于联大学子心中，代代相传，构成了西南联大精神的重要基石。

本书还采用亲历者集体口述的形式，极大丰富了公众对西南联大的认知，填补了同期史料空白，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原始素材。例如在陈竞志一篇中，作者通过深入访谈，详细呈现了他波澜壮阔的一生。作为蒋经国“铁血救国会”的核心成员，陈竞志的个人回忆不仅揭示了一段隐秘历史，也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了宝贵线索。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完成口述采访后，还对相关史料进行严谨核查，并加以标注，体现出良好的史学素养。

本书最动人之处，在于字里行间流露的温情与真诚。作者不仅完成采访任务，更与联大学子建立起深厚情谊。他曾协助吴德鋐搬家，探望住院的陈竞志并帮助寻找其昔日恋人，陪伴96岁的夏世铎看望老校友……这些看似日常的举动，成为打开历史记忆的珍贵钥匙。正是这份发自内心的尊重与关怀，使得受访者愿意吐露深藏心底的往事，如陈竞志最终道出未曾赴台的原委。这样的叙事不仅让读者感知真实的历史事件，更让人感受到跨越时代的人间温暖。从中我也获得重要启示：唯有以心换心，真正走进他人的生命历程，才能书写出触动人心的作品。

通读全书，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的校训愈发清晰可见。这不仅是联大人的精神底色，更是他们在艰苦环境中坚持学术理想与人格追求的内在动力。抗战时期物资匮乏、校舍简陋，师生仍保持昂扬的学习热情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因教室漏雨，师生转战茶馆继续授课讨论，形成独具特色的“茶馆文化”。教授们更是以身作则：梅贻琦每日步行上班，教授夫人制糕点为家中补贴家用，张奚若以“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勉励毕业生……联大教育将知识传授与人格塑造融为一体，塑造了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也为当代中国教育留下了宝贵遗产。

（作者为河北传媒学院学生）

近悦远来 书香重庆
书评投稿邮箱：cqrbdsb@163.com
电子书 有声书 扫码即可阅读、收听

让历史说话，重庆“上架”一系列抗战主题出版物

■新重庆-重庆日报 首席记者 韩毅

用史实发言、让历史说话，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再上新台阶。近日，重庆历史学界抗日战争研究重大学术成果发布交流活动在重庆大学举行，重庆历史学界的相关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发布了一系列重大学术成果，以学术之力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新征程的磅礴力量。

活动中，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协同创新中心、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发布了一系列重大成果，具体包括：

完成了由周勇主编的重大成果——《中国抗战大后方海外文献译编》，第一批选题共7本书今年将全部出版，涵盖《美国藏抗战大后方经济金融档案史料汇编》（吴景平、刘志英组织译编）、《抗战时期中国战区统帅部档案史料译编——以史迪威为中心》（吴景平、刘志英组织译编）、《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画卷——美国奥斯卡电影纪录片〈苦干〉史料译编选》（周勇等译编）、《荷兰盟友的中国重庆岁月：他们的生活与时代（1938—1946）》（张克雷编著；周昌文等译著）等。

出版了由周勇撰写的《历史学视野中的红岩精神研究》。全书共42万字，全面梳理了红岩精神研究40余年来的发展脉络，回顾了研究深化的历史进程，精准评析了研究中的新观点、新方法与新方向，充分展现了红岩精神在全国范围内的理论成果与现实影响，并首次提出了“历史学视域中的红岩精神”这个研究命题。

编纂完成了由王志昆牵头的《抗战时期英国驻华大使馆档案》，共计300册。接下来，该档案计划在2026年前完成全部300册全文OCR识别与双层PDF制作，建成“英国驻华大使馆抗战档案数据库（中英双语版）”；从2027年起，上线关键词全文检索、时空可视化分析、人物关系图谱三大功能模块，向全球学者开放注册；继续与英国国家档案馆、牛津大学合作，共同设立“中英抗战档案联合研究中心”，每年举办一次国际工作坊；开发面向中小学及公众的数字故事、微纪录片和VR场景，让尘封的档案走进课堂、走进街巷，成为人们的共同记忆。

完成了由刘婧雨主编的《美国主流媒体视野下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史料译编》一书的校审工作，预计今年年底出版。该书广泛搜集、整理和翻译了1937年到1945年期间，美国《生活》《亚洲》杂志、《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对中国抗战进行的广泛报道，内容丰富，涉及面广，其中绝大多数报道聚焦以重庆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是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的全景记录，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修复了电影《苦干》（2.0版），两个月前在美国奥斯卡博物馆放映，被赞誉为“不仅是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实践，更是中美通过文化合作增进相互理解、促进文明互鉴的生动例证”。

此外，还完成了以《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其经验研究》为代表的一批国家重大项目，实现了重庆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上抗战史研究零的突破；由蔡斐编著的《新华日报与统一战线》、潘洵主编的《侵华日军无差别轰炸史料与研究丛书》，也即将出版；新研究项目《抗战大后方研究和建设》，也已全面启动。

“这一系列重大成果，将进一步为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筑牢学术根基，推动中国抗日战争史研究再上新台阶。”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副会长、重庆市重庆史研究会名誉会长周勇称。